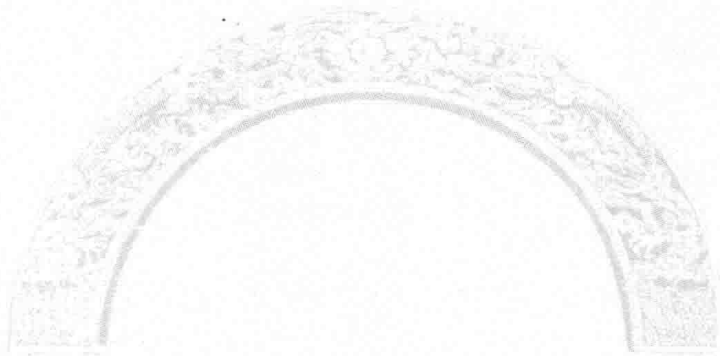




晚清汉学群体 与近代社会变迁

王惠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晚清汉学群体 与近代社会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汉学群体与近代社会变迁 / 王惠荣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61-3567-9

I. ①晚… II. ①王… III. ①汉学家—研究—中国—清后期
②社会变迁—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K207.8 ②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5745 号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25

插 页 2

字 数 270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晚清汉学群体与近代社会变迁》
(10YJC770086) 研究成果

本书出版获山西师范大学学术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近代社会与晚清汉学	(8)
第一节 近代社会与传统学术	(8)
一 经世致用思潮之兴起	(10)
二 儒学在近代倾向实用	(14)
第二节 晚清汉学	(22)
一 晚清汉学的时间范围、研究内容和特点	(24)
二 今文经学	(26)
第二章 晚清汉学群体分布区域及学术特征	(33)
第一节 道光年间的汉学	(34)
一 汉学地域之扩展、新的汉学中心的出现	(35)
二 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38)
三 由汉宋之争走向汉宋调和	(46)
第二节 学人游幕与晚清汉学	(50)
一 学人游幕对晚清汉学的促进	(52)
二 学人游幕有益于晚清汉学领域之拓展	(58)
三 学人游幕与学术文献之编纂	(61)
第三节 晚清汉学群体概观	(65)
第四节 晚清汉学区域之扩展与汉宋调和	(97)
一 汉学新区域的理学背景	(98)
二 新汉学群体的兼容汉宋	(101)
第三章 汉学家之思想取向与西学东渐	(114)

第一节	晚清汉学家与西学东渐	(115)
一	汉学群体促进西学东渐之内外因素	(117)
二	西学东渐中汉学群体之作用	(127)
第二节	思想演变与近代社会变迁	(134)
一	实事求是与西学东渐	(135)
二	汉宋之争与清中期的近代启蒙思潮	(153)
三	汉宋调和与中体西用	(160)
第四章	西潮冲击下的汉学群体思想之发展演化	(166)
第一节	浙江汉学群体	(167)
一	晚清浙江汉学群体思想演变之渊源 和时代背景	(168)
二	地域文化与近代社会交互作用下的 浙江汉学群体	(170)
第二节	岭南汉学群体	(187)
一	道光年间的岭南汉学群体之思想取向	(188)
二	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的岭南汉学 群体之思想发展	(191)
第三节	湖南汉学群体	(200)
一	古文经学群体	(202)
二	今文经学群体	(213)
第四节	吴、皖汉学群体	(220)
第五节	今文经学群体	(226)
一	道光、咸丰年间今文经学家的思想倾向	(227)
二	同治、光绪年间今文经学家的维新思想	(229)
第六节	西北史地学群体	(232)
一	道光、咸丰年间西北史地学者之史 地经世思想	(233)
二	近代化视野下的西北史地学者	(242)

第五章 汉学群体的近代社会实践	(251)
第一节 汉学家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	(251)
一 汉学家与区域近代化	(252)
二 辅佐洋务新政, 实施科学救国	(260)
第二节 投身近代新兴文化教育事业	(265)
一 新式教育	(266)
二 文化事业	(274)
第六章 晚清汉学群体在近代社会中的历史作用	(279)
一 汉学群体对儒学和孔子的维护	(279)
二 汉学群体在近代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	(284)
附录:《时务报》内讧背后的学术与地域之争	(288)
主要参考文献	(307)
后记	(321)

导 论

一 问题的提出

为什么要研究晚清汉学群体，以及他们与近代社会的互动？直接的原因是此课题在中国近代文化史或学术史中迄今没有人予以关注。至于深入的原因和意义则与我十余年来在从事的关于近代学术文化的研究中，一直所关心的问题有关，而这个问题也为很多学者所关注，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提出的：“第一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第二是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在现代的处境。”^①从这个角度出发，本课题的研究，或许可以部分的回答这个问题，有助于从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寻绎到中国早期现代化逐步展开的来自传统的思想和学术源泉。

晚清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儒家学术不再一家独尊，其绝对优势地位由于西学的涌入和挑战而逐渐失落。清中期的学术主流学派是乾嘉考据学，也就是汉学。道光以降，西学东渐，学术发展趋于复杂，汉学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对晚清学术有所影响。

乾嘉年间是汉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因而很多学者认为，过此以往，汉学便趋衰落。在近代儒学总体衰落的大环境下，汉学之辉煌诚然不再，但是，由于汉学大吏的提倡、汉学书院的增多、

^①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总序》，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学人游幕的继续，汉学逐渐从江淮、京师一带发展到全国，汉学家遍及各地，出现新的汉学重镇，这些新因素使得汉学的发展规模在晚清有了很大进展，依然保持了强大的影响力。如此则汉学家成为近代一个重要的学者群体，于社会之发展不能不发生重要影响。

中国由传统步入近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列强侵略这一外力的促动，不过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自身的力量也发挥了重要的内因作用，其中一个体现就是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对西学的接受、传播、应用。汉学群体也有重要表现，因为他们在接纳西学方面较其他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有着先天有利条件。首先，清代汉学涉及领域很广，举凡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天文历算、金石地理等皆包含在内，尤其是天文历算，可以说是乾嘉汉学家的必备基础知识。其次，乾嘉年间盛行的汉宋之争，为汉学家萌生反对宋明以来强化了纲常伦理以及束缚个性的世俗成见在学术上做了准备。乾嘉年间的汉宋之争更多表现为汉学家对宋明理学的排斥，这种学术态度容易使汉学家摆脱宋明理学的束缚，批判苛刻的礼教以及重新审视天理、人欲之关系，提出新的“情理观”。最后，乾嘉汉学家继承明末清初以来学者对天文历算的研究，对此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这种现象对传统的“重道轻艺”观念多少有些改变，有利于西方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

发展是传统与现代的统一，脱离传统便无所谓民族的现代化。梁启超曾指出：“本朝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惜乎其用不广，而仅寄诸琐琐之考据。”^① 不仅如此，汉学家在思想上还富有近代启蒙特点，对

^①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

名教有所批评，对传统的义利之辨也提出新的看法，这一思想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的发生，如俞正燮维护妇女的权益，主张男女平等，沈垚对商贾的拔高评价等，凸显出在近代来临的前夜，汉学家的思想中已出现近代人文主义色彩。龚自珍曾批评学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将聪明才智用于训诂考据，实际上，这种批评并不一定合乎实际。清康、乾之际，在文化高压政策下，学者确有不谈时事的禁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断绝了经世之志。乾嘉汉学家固然蔽聪明于考据一途，但是在考订经史中也寄托了经世之思，不仅仅是为考据而考据，因为“圣人之道，存乎典章制度”，如徽州学者对《礼》经的重视以及对《仪礼》的考订与阐释。

到了晚清，崇尚汉学或受汉学影响的学者较乾嘉年间有明显增加，成为传统学者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术群体。这一学术群体遍布全国各地，在前贤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率先提出抵御列强侵略和富国强兵的近代化策略，即“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和“以中国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

在近代化的实践中，汉学群体做出了重要贡献，从科技到经济、政治、学术、教育等领域均有汉学家的足迹和踪影，如魏源、李善兰、邹伯奇、冯桂芬、王先谦、孙诒让等。当然，在此当中，汉学家也受到时代变迁的潜移默化，其思想和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效法西方列强将无以自存，在同光年间，成为很多汉学家的共识。在此认识下，他们翻译西书、兴办新学堂、创建新企业、发行报刊、成立学会、鼓吹维新甚而参加民主革命，这些作为带动了地方的近代化，从而推动了整个近代社会的发展。

从乾嘉到光宣，汉学家在思想和实践上的变化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之变迁，而且有力地说明了传统文化所赋予近代化之内在力量。汉学群体与近代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影响，昭示了传统文化在中国近代化中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然而，

汉学和汉学群体在近代化中的这一价值和意义却一直没有获得学界瞩目，甚少有文章涉及这个问题，专著亦付诸阙如。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本书的写作即是弥补这一缺憾的一个尝试。

二 研究内容

本书的写作围绕三个主要内容进行，首先是晚清汉学。本书第一章、第二章都有对晚清汉学的讨论。之所以费这么多篇章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感到学界对此关注不够，而这个问题不说清，似乎也影响到对汉学群体的了解。乾嘉汉学的辉煌掩盖了此后汉学的发展。过去人们谈到清代学术首先想到的是乾嘉考据学，谈到清代汉学也主要将目光集中于乾嘉年间，对此后汉学的发展几乎视而不见，在人们的意识中汉学在道光以后就衰落了。实际上，汉学在晚清确实没有了乾嘉年间的鼎盛，但也不能简单地归为衰落。晚清的汉学无论研究领域还是治学人数都较乾嘉年间有进一步发展，汉学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学派也是在道光年间。道咸年间，程朱理学虽有复兴，但是它的影响还不能和汉学相提并论，汉学在此时依然是传统学术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学派。有鉴于此，本书在第一章中提出了“晚清汉学”这个概念，此概念的提出并不是泛指晚清阶段的汉学，而是相对于乾嘉汉学及其本身的重要性特别提出，希望借此引起人们的重视。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已有学者注意到晚清汉学，到本世纪也出版了重要著述《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也有一些博士学位论文涉及这个问题，如《晚清汉学研究》、《清代书院与汉学的互动研究》，但是这些远远不够，因为对于一个全国性的学派而言，不仅仅是几个学者、几种论著所能研究透彻的，何况是处于一个巨大社会变迁中的学派，它需要更多的人去关注、去探究。对晚清汉学在写作中本书本着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宗旨，没有面面俱到。例如关于晚清汉学发展的原因，有三个

重要因素，即汉学大吏的提倡、汉学书院的兴起、学人游幕等。前两个因素已有论著详细探讨，本书对此点到为止，而将重点放在学人游幕上。

其次，关于汉学群体。晚清汉学家在学派上来说是一个群体，但是这些群体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具有地域特征，因而，又形成几个重要的地域汉学群体。道咸年间，传统的汉学区域安徽、江苏开始衰落，于此前后，在浙江、广东、湖南兴起了新的汉学重镇，这些新兴的汉学重镇以及正在衰落的安徽、江苏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仅此还不足以囊括不在此区域的重要汉学家，因而，又列出晚清汉学中的两个重要学派西北史地学派和今文经学派，这两个学派的兴起在嘉道之际。尽管如此，本书所论及之学者不可能涵盖所有晚清汉学家，另外也不是所有汉学家在近代社会变迁中都有所作为，所以本书只能对有代表性的汉学家进行重点探讨。

最后，汉学群体与社会变迁。汉学群体在近代社会的具体作为，其接受西方文化的思想和学术渊源，及其受近代社会变迁的影响如何是本书讨论和研究的核心，而通过这一系列的探讨，展现汉学与近代社会之间的联系则是本书的初衷和目的。

因为进入近代社会的特殊性，中国的近代化最初主要是由传统士大夫中的开明之士推动。在救亡图存的危机感的促动下，部分传统士大夫提倡效法西方，兴办近代企业、改革教育、参与政治变革。作为传统学者中的重要群体，汉学家也积极参与了近代社会实践，从近代化思想的提出到新企业、新学堂的创办再到维新变法，都有他们的身影。如果不是对近代化中一些有影响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及官员的学术背景做过细致考察，很难想象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即汉学家，如魏源、李善兰、华蘅芳、冯桂芬、郭嵩焘、孙诒让、吴大澂等。这个发现，无疑会使我们对传统文化在近代化中的作用又有了新的

思考和认识。

近代化的进行，近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不断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和力量，清代汉学家在此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在此过程中，他们不免牵强附会，但是毕竟在文化上和心理上为近代化提供了支持，如孙诒让著《周礼政要》就是为清季新政在儒家经典中寻求根据和渊源，他在《叙》中说：“中国开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尚于周，故《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然则华盛顿、拿破仑、卢梭、斯密亚丹之伦所经营而讲贯，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前之旧政已发其端。吾政教不修，失其故步，而荐绅先生咸茫昧而莫知其原，是亦缀学者之耻也。辛丑夏天子眷念时艰，重议更法，友人以余尝治《周礼》，嘱掇摭其与西政合者甄辑之，以备财择，此非欲标榜古经以自张其虚骄，而饰其窳败也。夫亦明中西新故之无异轨，俾迂固之士废然自反，无所腾其喙焉。”^①

晚清汉学群体与近代社会变迁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彼此促进的关系。国家适逢危急存亡之秋，汉学家为挽救危亡，挺身举办新政，推动社会变迁，而变化了的近代社会又对汉学家施以影响，使他们的思想随时代而进，其胸怀、视野和认识都与乾嘉汉学家有显著不同。当然，晚清汉学家在思想上发生迎合时代的变化，还在于部分汉学先贤在清中期就已经萌生了具有近代意义的观念和意识，另外，嘉道以降，学术思想的逆转，即由反对宋学到调和宋学，也使汉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放下门户之见，学术态度较为通融，有利于对西学的接受。

^① 孙诒让：《周礼政要叙》，《大戴礼记斟补》（外四种），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41页。

三 需要阐明的几个问题

1. 关于时间断限

本课题的研究涉及晚清汉学的时间断限问题。一般认为嘉道之际清朝进入衰世，清朝之晚期亦由此时开始。本来学术于社会之发展有其相对独立性，学术之发展不必以社会之发展来划分阶段。不过就清代汉学来说，恰好乾嘉年间是一阶段，而道光以后进入另一个阶段，因而，晚清汉学之上限定在嘉道之际较妥。

2. 关于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家不在瞩目之列，虽然为了研究的系统、学派的完整性考虑，在文中亦涉及今文经学及其学者，但不是重点。原因在于关于这一研究，尤其是以魏源、康有为为代表的在近代政治变革中有重要影响的今文经学家，已是成绩斐然，因而，本文更为关注的是研究较少的古文经学家的近代实践。

3. 清中期以至清季汉学家在汉宋关系主张上的变化

本文虽然研究的是近代的汉学群体和社会变迁，但是由于近代的汉学家和乾嘉汉学家一脉相承，前者的思想和治学受到后者影响，因而，不适当追述乾嘉年间的学术思想以及治学情况将难以明白晚清汉学群体何以接受西学较理学家为易。尤其是汉学家对待汉宋关系的思想和态度前后截然相反，从诋斥到兼容。而出现在不同时期的这两种态度，虽相反却相成，均成为促进近代社会变迁的来自传统文化的思想源泉。

第一章 近代社会^①与晚清汉学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步入近代社会。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如果以 1919 年为下限，这一过程就中国受西方影响的程度和范围而言，以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西学东渐较缓，其影响也主要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的传统学术仍然可以按既有轨道发展；在后一阶段，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清政府被迫实施改革，中国开始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大量涌入，中国的传统学术也进入了全面衰落。

第一节 近代社会与传统学术

从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步入近代社会，亦走上了缓慢的近代化过程。由于中国的近代化是在西方的影响或压迫下被迫进行的，那么它引起的中国内部的变化便不是一帆风顺，而是迟滞和反复。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变迁的初期，传统文化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最初的消极意义更大些，但是也不乏促进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因素。而传统学术在西学东渐中亦不是完全表现为排斥或无所作为，而是在某些领域为西方文化落户中国提供了契机和助力。

① 为与晚清汉学保持一致，本文所指近代社会的时间范围限定在 1919 年之前。

道光二十年（1840）是中国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迁的起点，而在此前后，中国传统学术也有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源来自中国内部的王朝危机而非民族危机。清朝到乾隆后期已现衰象，吏治腐败、经济衰落、军备废弛、社会矛盾尖锐。从嘉庆元年（1796）到道光二十年（1840）的近半个世纪中，人口膨胀而导致的生存压力持续上升，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漕运、盐政、河工诸大政无一不衰敝已极，积重难返。天灾人祸的交相煎迫之下，民生日蹙，人民不得不揭竿而起，据统计，在此45年间，规模较大的各种起义多达十多起，平均三年就爆发一次。^① 清朝至此进入衰乱之世。政治、经济上的变动在学术上必然有所反映，清朝后期士习转变之剧、变化之大朝野共睹，后人对此亦颇为关注。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对道光朝学风士习之转移做了简要概括，基本道明了这种变化的前因后果：“嘉庆朝，承雍、乾压制，思想言论俱不自由之后，士大夫已自屏于政治之外，著书立说，多不涉当世之务。达官自刻奏议者，往往得罪。纪清代名臣言行者，亦犯大不韪。士气消沉已极。仁宗天资长厚，尽失两朝钳制之意，历二十余年之久，后生新进，顾忌渐忘，稍稍有所撰述。虽未必即时刊行，然能动撰述之兴，即其生机已露也。……至道光时则时事之接触，切身之患，不得不言有三端：曰盐，曰河，曰漕。议论蜂起。当时亦竟有汇而刻之以传世者，贺长龄之《经世文编》是也。未几海警渐动，士大夫急欲周知外事，疆臣为倡，林则徐之译各国图志，徐继畲之译《瀛寰志略》，皆为筚路蓝缕之功，而纪蒙古之《游牧》，作藩部之《要略》，皆在于此时。道光间学士大夫之著作，非雍、乾之所有，亦可谓非嘉庆朝所有矣。盐、漕、河三事，能文绩学之士

^① 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页。

皆有论述，而当事之臣采用之，朝廷听纳之，颇有改革。……此道光朝之国事，亦即道光朝士习所由成也。”^①

在社会充满危机的情况下，原来的学术格局因社会的变局而逐渐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几个方面：学者不问政治的态度开始变化，提倡经世致用；宋学复兴；汉学家不再极端排斥宋学，今文经学影响扩大，汉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诸子学研究走向繁荣。这种变化有益于稍后西方文化的介入，对近代社会之变迁不无促进作用。

一 经世致用思潮之兴起

齐思和曾说：“夫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② 传统学术在近代前夜最显著之变化是兴起于嘉道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潮。清朝中衰引起部分官员与学者的忧虑，为挽救王朝危机，学者如魏源、包世臣、龚自珍等著书立说，提出各种改革意见，“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③。官员如阮元、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则延纳各种经济之才，对关系国计民生之事务进行整顿和改革。这些人互通消息、彼此砥砺、通力合作，发议论、办时务、倡改革，将经世致用思潮推向高潮。道光七年（1827）魏源代贺长龄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刊行，标志着经世致用思潮在晚清复兴。

“经世”即“治世”或“理世”，等同于“经济”，意为“经邦济民”。经世致用这一积极的入世价值观在先秦儒家就已

①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14—615页。

② 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载周阳山、杨素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第3版，第194页。

③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